

乡村生态的现代性寓言

——解读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的生态视野

林 铁, 王江生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 将乡村生态这一视野纳入其文学思考的维度, 展示了纸房这个西部传统乡村, 在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进驻之后, 土地资源、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在现代性的语境下, 纸房这个乡村的生态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生态)出现了断裂, 而且, 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社会生态)上也出现了身份错位, 人的精神信仰(精神生态)出现了祛魅后的苍白。《纸房》成为当代乡村生态现状的一个现代性寓言。

关键词: 《纸房》; 乡村生态;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 现代性

无可否认, 20 世纪以来, “乡村”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资源, 已汇聚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常常可见, 知识分子通过描述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曲折而无可逆转的巨变, 表达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召唤与反思、追寻与责问的复杂心态。文学乡村已成为诸如政治形态剖析、伦理道德反思、文化批判以及精神家园建构等问题的阐释文本。近日, 贵州作家冉正万推出了最新长篇《纸房》, 将乡村生态这一视野纳入其文学思考的维度, 展示了纸房这个西部传统乡村, 在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进驻之后, 土地资源、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作者全方位地思考了我们正在遭遇的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社会生态问题, 揭示出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乡村生态危机的根源远远不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而是深层次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人的精神信仰、社会认同与人的自然观照一道, 共同构成了乡村生态现代性危机的三重内涵。

一 自然生态: 土地伦理缺席与背叛下的剧痛

和大多数进行生态写作的作家们一样, 冉正万对乡村的自然山野有着一种热爱和诗意的亲近。有着 13 年地质队工作经历的他, 对脚下的土地更是有着职业性的敏感和细腻的观察力。《纸房》一开头,

便写道: 听我说吧, 我九岁的时候, 纸房的山是青的, 水是绿的, 雨滴是干净的, 下雪时, 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 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嘀嗒作响。作者在描写中以一种欣赏与享受的姿态融入自然美景中, 并赋予自然极为丰富的生命力。然而, 作者的目的不是沉醉于这一美景, 而在于感伤此景的突变: 山变样了, 水干涸了, 雨水浑浊。雪很少下, 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 还没落到地上就被漫天的尘土裹挟而去, 即使掉到地上, 也担忧惊怕似地往土缝里钻。这前前后后, 作者对自然的拟人化叙述手法没有变, 变的是大地的面貌, 以及背后隐藏的关于大地价值观念的变化。从小说的整体看, 在探矿队与黄金公司进驻纸房的前后, 存在着两个乡村, 存在着两种对待乡村大地的价值观念。

于是, 小说关于自然的叙述便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即土地的原生之美与商业价值之间的冲突, 换言之, 是土地伦理与唯利原则之间的冲突。所谓土地伦理, 在美国生态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先驱莱奥波尔德看来是指这样一种东西, 只有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 它才是正确的, 否则就是错误的。^{[1][2][3]}而唯利原则恰恰相反, 完全不顾及生物共同体的和谐, 不尊重自然生物的生命价值, 只图从中索取其可能的经济价值。唯利

*收稿日期: 2008-11-05

作者简介: 林 铁, 男, 湖南长沙人,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文艺美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化与当代文学; 王江生, 男, 湖南邵阳人,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传播文化与当代文学。

原则的背后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土地伦理则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193}这两种原则的冲突贯穿于《纸房》始终,作者的目的是通过唯利原则对土地伦理的反叛与压制,凸显出当代乡村自然生态所遭遇的难以愈合的危机。

黄金公司开进去后,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大树全部砍倒了,小树则被连根挖起来运走。就像一个姑娘被突然剥了个精光,变成了不知羞耻的荡妇,任人宰割和开采。挖掘机挖出来的树根横七竖八地摆在了一边,像大地的肠子。纸房以前是一个四季常青的地方,现在一点绿色也看不见。山坡上的树被砍光了。屋前房后的还没有砍,看不见的原因是尘土,漫天飞扬的尘土一旦遇到大雾或者雨水就掉下来糊在树叶上,不管什么树,全都成了一种颜色,像一个喜欢死亡的画家画上去的。菜园里的菜,洗第一遍可洗下半盆泥浆。浑水泼到地上,声音发沉,不像清水那样清脆,而且也流不远,每滴水都被泥浆抱住了。泥浆也害怕失去水,没有水它们就会被风扬起来,在空中忽上忽下,成为风的玩物。小说中的“我”被自己所看到的景象弄得不知所措。不管往哪个方向看,都不再是我所熟悉的颜色。漫山遍野都是勘探井,到处是新鲜的黄土,它们像疯子脑海里的词汇和念头,也像从大地的耳朵里流出来的浅黄色的惊恐的血液。好好的山坡上开出大路,原先黑黢黢阴森森的灌木丛被彻底摧毁,露出不再神秘的地貌。当纸房人沉浸于开山掘矿的财富梦想时,纸房的土地却在承受着被蹂躏的剧痛。

值得一提的是,《纸房》特意描写了几次动物的异常行为。首先蚂蚁的集体出逃,数不清的蚂蚁从各自不同的部落里跑出来,开始时像麻线一样势单力薄,但那根麻线越来越粗,最后变成一根粗大的绳子。蚂蚁部队汇集成这样一根大绳子翻过山坡,朝着人不知道的地方远去。无论纸房人怎样想尽办法阻止蚂蚁的队伍,蚂蚁们都义无反顾地继续村外奔走。“每个蚂蚁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走了,再见了。”其次是老鼠的突然冒出。老鼠东奔西走,遍地都是它们丢弃的粮食和杂物,屋子里、院子里、小路上,这里那里,全是老鼠的杰作。老鼠成群结队地出现在纸房,但不久又突然一下不见了。再次是蛇的猛然出现,它们在一夜之间取代了老鼠的统治地位,纸房兴起了一股捕蛇的热潮。

动物的异常行为是对大地的非自然变化的反应症候。正是因为纸房的自然生态遭遇着人为的破坏,扰乱了蚂蚁、老鼠、蛇等动物的原始家园和生态链。这种描写提示了作者的生态理念,即与土地、自然植被一样,动物们同样有着不依赖于经济利益和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权利。这种权利一旦不被尊重甚至反被蹂躏,动物是会抛弃人类的,而最后自食恶果的往往是人类自身。土地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土壤、水、植物、动物)都有“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1]212}土地伦理是人的伦理的延伸,而动物的行迹实际上隐喻了纸房人的最终命运。

二 社会生态:家庭与身份转换中的尴尬

代表现代性力量的黄金公司的进入,带给纸房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自然生态的破坏。然而,冉正万在审视乡村现代变迁的时候,体察得更深刻的是纸房社会生态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自我认同方式的变化是他在《纸房》中剖析乡村社会生态的重要切入点。黄金公司进驻纸房,改变了乡村面貌,更改变了将纸房人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关系纽带。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黄金公司进驻前,纸房属于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按照滕尼斯的看法,这种传统社会的基本色调是共同体,共同体指称的是基于自然感情而紧密联系起来的有机社会,它强调的是群体成员之间唇齿相依的情感关系和互相肯定或一致的意志关系。^{[2]341}纸房属于因地缘和血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乡村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社会秩序的整合借助于人与人的直接的依赖关系,只能直接诉诸于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地缘等自然的联系纽带。纸房这个地方主要以冉姓为主,居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前现代社会生活。一家有个难处,四方都来帮衬。比如谁家死了人,殓文忠会义不容辞地去哭丧,四邻都会不请自来帮忙办理后事。因为谁都觉得哪家都迟早会遇上这样的事情,帮别人也是帮自己。连自私自利的村长李自强第一次与前来租房的勘探队的人接触时,一开始也没有想到收租金,租金是勘探队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在没有弄清楚勘探队来纸房的实际目的是找金矿前,李自强对待他们就如同对待纸房其他居民一样,大家彼此属于纸房这个乡村共同体,彼此依赖彼此共生。查尔斯·泰勒认为,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总是被锢所在给定的地方,一个

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3]正是这些秩序限制了传统社会人们的流动变化, 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在性与直接性, 同时赋予了人们彼此依赖在一起的生活意义, 纸房人彼此相属, 没有隔阂和私利。

以纸房居民之间的爱情关系为例, 发生在纸房的爱情都是自自然然的。比如母亲与蛇贩子之间的爱情, 寡妇张雨晴与丧偶的父亲之间的爱情, 乃至姨父李国田与刘金桃之间的爱情, 这些爱情皆属于婚姻存在前提下的私情。蛇贩子是母亲和父亲结婚前的情人, 婚姻没有让他们的关系断裂, 母亲甚至因为被父亲阻止去看病入膏肓的蛇贩子而服毒自杀, 爱得荡气回肠。而张雨晴与父亲之间也出于一种自然本能, 没有掺杂其他条件。张雨晴的主动, 父亲被冷落后的吃醋都是生命的自然体现。而李国田不喜欢没有性格的二姨, 却和泼辣的刘金桃打得火热。这些人爱得主动自然, 皆出于生命的真挚而坦诚, 他们所承受的嘲笑、反对、抨击都是缘于纸房人传统的道德观念, 但这些最终都没有阻止他们继续相爱。

然而, 这种爱情关系到了后来便发生隐秘却巨大的变化。比如二姨这个人物, 她既遵从传统妇道忍气吞声随了不爱她的李国田, 也出于自然的情感爱上了父亲, 但到了后面, 她由一个宽厚仁慈的传统妇女变成了一个斤斤计较的市井妇女。首先她出于生存的经济需要, 与和她并不相配的鞋匠结婚, 情感本质被物质生存的需要所覆盖。二姨为了占据“我”的房子作为门面, 想方设法讨好“我”, 甚至与想成为“我”妻子的刘佳惠为了门面破口大骂, 最后竟然背着“我”, 先斩后奏撬锁占据门面, 撕破了这对姨侄之间原本深厚的亲属关系。经济利益成为变化后的纸房人之间不得不面对的关系纽带, 它改变了纸房人传统的出于生命本然的真诚, 这一切都是黄金公司进驻纸房后带来的。

甘阳认为, 前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所谓“第一级关系”(自然血缘关系、亲属关系, 即儒家所谓“亲亲尊尊”)为基础; 现代化社会人际关系则以所谓“第二级关系”(工作关系、法律关系)为基础。^[4]这种从“第一级关系”向“第二级关系”的变化被英国法律史家梅因表述为“从身份到契约”。这里的“身份”指的是天生的或者自然存在的先赋先天的社会角色, 而“契约”不同, 马克思认为契约是“通过交易而获得的财物的契约”,^[5]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关系, 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其最主要的特征表现为独立而又平等的主体以及自由合

意的关系。

在纸房的传统生活里, 不存在主体或者个体的问题, 也没有自由意志, 强调的是共同体, 和约定俗成的共同体的道德伦理规范。而黄金公司全面进驻纸房, 置换了纸房人的家庭关系、爱情本质和生存依据, 最典型的变化在于它使得纸房人陷于一种自我认同的尴尬: 从以种庄稼为生的农民到在黄金公司上班的农民工, 从以土地为依靠的农民到领补助款迁至香溪的乡镇居民。这种身份转换中, 契约关系成为主导。在田野里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成为一去不返的生活方式。田野被废弃, “我”执意种稻不去矿上反而被认为是偷懒。成为矿上的临时工人之后, 每天又津津乐道于土方与薪水, 同时又衍生了更多的明争暗斗。同一座山头, 有好挖和不好挖之分, 离浸泡池有远近之分, 动作慢了好地盘就会被别人抢去。更严重的是, 搬到香溪去之后, 在传统农民与乡镇移民之间, 纸房人无法自处。他们一方面因为拿了搬迁费住了新楼房而沾沾自喜, 又无法舍弃那种根植于土地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搬家的时候明明知道以后不能耕种, 还要坚持带上犁铧和钉耙。明明用上自来水, 还要花大力气搬来几吨重的石水缸。一楼被迫改造成猪圈牛圈, 更滑稽的是, 以前在纸房上了年纪就在后屋檐为自己备一口棺材, 现在搬到香溪前后没有房檐, 只好摆在面门外的街沿上, 这就等于摆在大街上, 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

纸房人对乡镇新生活的不适应表明, 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契约关系拓展了人与人的交往空间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同时也制造了自我认同的迷失。经济利益的多寡取代传统伦理成为人们行为的圭臬, 同时也剥离了纸房人生命中的那份自然与真诚。这正是现代性的悖论在乡村生态中的体现。

三 精神生态: 神性与诗意祛魅后的苍白

“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6]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锢中解放出来, 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 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 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冉正万在《纸房》中暗示了现代社会出现的主体性的悖论: 一是人越来越成为自然的主宰, 却也越来越严重地被自然所惩罚。黄金公司的过度开采和化学污染, 使得人畜死亡、山体滑坡、粮食歉收等等, 最终逼迫人们搬离纸房这个固有的家园。二是人越来越独立于传统的乡村共同体之外, 最终却使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单一化, 价值空间苍

白化的境地。后者便涉及到乡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精神生态问题。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同时也会发生在精神领域。而且无论是自然生态失衡还是社会生态失衡,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生态人的价值观念出了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意味着自律精神和理性精神,正如康德所说的“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7] 22}理性成为现代人改造世界和阐释世界的方式。在《纸房》的叙述中,作者平行安排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哭丧匠陈文忠,一个是中学老师李国田。前者代表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观念,后者无疑是现代理性主体精神的化身。在纸房,陈文忠和李国田在每一件事情上的看法几乎截然相反。比如,纸房地下冒出光柱,蚂蚁突然从纸房集体逃走,在陈文忠看来,地下冒光等于纸房跑了灵光,甚至是跑了人的生命,而蚂蚁逃走更是纸房的凶兆。但是李国田不同,他从地里取了几包土,拿去化验,得出的结论是土壤的化学成分超标是蚂蚁逃离根本原因。陈文忠对地质勘探队心存敌意,并警告四邻,“等他们把纸房的宝物取走了,纸房就完蛋了”。而在李国田看来,勘探队找的不是宝物,而是矿藏,并断定如果真找到矿,纸房的人就要发财了。纸房里蛇的大量出现和捕蛇热潮的兴起使得两人的意见罕为一致,但说法不一样,李国田认为捕蛇是愚蠢的,蛇是老鼠天敌,蛇跑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而陈文忠认为蛇是神物,最聪明最有灵性,你伤害了它,它会永远记住你并找机会报复,且会把仇恨遗传给下一代。

陈文忠和李国田使用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精神观念。万物有灵的神性观念是支撑陈文忠精神世界的法则。陈文忠认为纸房的山水尘土与纸房人的生命是相连一体的。黄金公司进驻纸房之后,纸房的土地被现代机械不停地挖掘,陈文忠因此如遭大病,他觉得:“纸房的地脉被他们钻到了,我在纸房活了几十年,我身上的命脉和纸房的地脉已经分不开了,他们到处挖到处钻,我身上到处痛。”陈文忠心地善良,他认为哭丧不是什么羞耻或者不吉利的事,而是在歌颂天地的慈悲之德。他不愿意搬离纸房,他认为与其住到香溪,不如住山洞。人与天地合一,人的生命与自然、与生活的土地息息相关。李国田恰恰是对陈文忠观念的祛魅。自然是可以被人所控制、计算和规划的对象,自然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生存的资源。在纸房,李国田的生活冷漠而充满秩序,他丈量世界的是工具理性的尺度。

有意思的是,陈文忠的谶语和李国田的预言双

双得到验证。纸房人的确因为矿藏发财了,但纸房也果然被毁灭了。最后,反倒是不久于人世的陈文忠借钱给李国田,支持后者发明一个能恢复纸房生态环境的机器。这个黑色幽默暗示了现代性的悖谬,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失所决定的,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8] 195}

从精神生态的层次上,人与对自然的神性观照被祛魅的后果相连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诗意想象也遭到了无情的剥离。在《纸房》的叙述中,诗意想象与世俗精神形成鲜明的张力。从一开始都对纸房开矿存有疑虑甚至恐慌的“我”始终没有加入到黄金公司的农民工队伍中去。“我”喜欢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宁愿在喧嚣的纸房独自开垦自己的土地,在油菜田里坐15个小时,完整地观察到一朵油菜花开放的过程。“我”暗恋护士桑红,将这份痴痴的爱恋化作无止境的思念。在别人的嘲笑中,买来一块地种上木槿花,因为想到花开就能见到桑红。与之相对的是刘佳惠,刘佳惠为了靠近“我”,不断地率领香溪的女人来采购木槿花,在“我”的眼中,木槿花是桑红的替代物,是美好爱情的象征,在刘佳惠眼里,木槿花是获取爱情的中介物。桑红遥不可及,而刘佳惠却黏上“我”并全面占领“我”的生活。这正显示了冉正万通过纸房的变迁审视现代人精神生态后的万般苦涩。

参考文献:

- [1] [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2]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3]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4] 甘阳.古今中西之争[M].上海:三联书店,2006.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6]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上海:三联书店,2000.
- [7]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8]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黄声波)